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诗性江南的道与怀

姜晓云 著

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倒映在江河湖海之中的，是妩媚的青山，是缤纷的花树，是低徊的明月和清风，是杏
花春雨下轻轻摇动的舳舻；生长在这片温软土地之上的，有莼鱼稻香，有诗酒和似水流年，有自由如风的快乐岁月，还

有空灵玄虚的思想。徜徉在这四季别样的水光山色里，江南的读书人除了吟啸欣赏与冥会玄思，似乎很少再去进行繁复
的理论的追问，而特别讲究顿悟与超脱。江南人秉持的这种生命精神和生活态度，诚如孙绰所云：『恣语乐以终日，等
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处在这样的境遇中，江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绝不是西方物、我两分的认识论（真），也不是儒家身、心两分的
道德论（善），当然也不是现代心、脑两分的审美论（美），而是「不知己之是己，不见物之为物」、以「质有而趣灵」
的方式存在的诗性智慧。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可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013068947



诗性江南的道与怀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姜晓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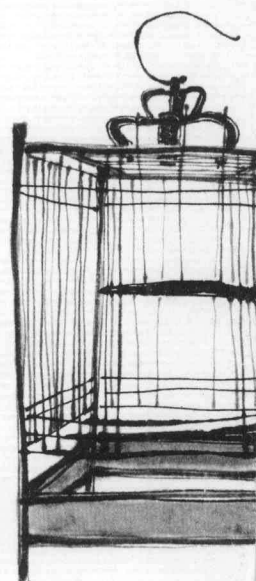
I267.1
1460



北航

C1676613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江南的道与怀 / 姜晓云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6

(中国风: 江南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92-874-5

I. ①诗… II. ①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2479号

书 名: 诗性江南的道与怀

编 者: 姜晓云

责任编辑: 夏楠 鲍晟

封面设计: 钟巧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2-874-5/J.834

定 价: 40.00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主编人语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闹，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了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莼芽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7日于南京白云园

内容提要

读点书，喝点酒，弄点风花雪月，不失为一份雅事，但在诗性的江南，这却成了一种流俗。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倒映在江河湖海之中的，是妩媚的青山，是缤纷的花树，是低回的明月和清风，是杏花春雨下轻轻摇动的舳舻；生长在这片温软土地之上的，有莼鱼稻香，有诗酒和似水流年，有自由如风的快乐岁月，还有空灵玄虚的思想，足以让你游目骋怀，在品味四时别样的佳兴的同时，更有一层精神上的顿悟和心灵上的超脱。本书的作者长期旅居在江南，读书时有所思，生活中有所感，并在精神上对江南文化中自然澄明的诗性哲学有着深切的皈依。本书的文章篇幅上有长短，内容上有浅深，形式上也多样，总而言之是自然为之，是对诗性江南澄怀观道的一种结果，可以一观。

前言

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倒映在江河湖海之中的，是妩媚的青山，是缤纷的花树，是低回的明月和清风，是杏花春雨下轻轻摇动的舳舻；生长在这片温软土地之上的，有莼鱼稻香，有诗酒和似水流年，有自由如风的快乐岁月，还有空灵玄虚的思想。徜徉在这四季别样的水光山色里，江南的读书人除了吟啸欣赏与冥会玄思，似乎很少再去进行繁复的理论的追问，而特别讲究顿悟与超脱。江南人秉持的这种生命精神和生活态度，诚如孙绰所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处在这样的境遇中，江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绝不是西方物、我两分的认识论（真），也不是儒家身、心两分的道德论（善），当然也不是现代心、脑两分的审美论（美），而是“不知己之是己，不见物之为物”、以“质有而趣灵”的方式存在的诗性智慧。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可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在江南的自然天道、玄学、南禅、心学、诗学等思想资源中；也由于诗性智慧的整体思维的特点，江南的文化思想总是与日常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的升华。扎根在江南民间的这种诗性智慧基础之上的，就是江南文化中呈现出来的诗性哲学。

宗白华认为：“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澄怀观道作为江南诗性哲学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进入这种境界的根本方法。澄怀观道是自六朝以来在体味江南山水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与形成的，当然，经过如此“玄览”之后的江南山水也显得更加明丽动人。受此影响，生长其中的江南学人既喜爱精神上的“玄思”，也爱好“四时佳兴”，而且往往以“直见本心”的方式行事，言谈之中充满着自然精神，充满着诗性智慧。

本书收录的诗文为自己久居江南、沉潜滋味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十多年来对诗性江南的诗与思。其中，思想篇、审美篇、读书篇侧重于“思”，体现形式是短论和笔谈；游历篇、闲居篇侧重于“诗”，体现形式是诗歌与随笔。私下认为，体现江南，最好的文体为诗（词、曲），其次为散文，再次为小说，最次为论文。但在诗性的江南，无论是诗还是思，无论是诗还是文，澄怀观之，都是一种生命的自然咏唱，大约每个人都能从中直接体会得到的。

目 录

主编人语·····	(一)
内容提要·····	(一)
前言·····	(一)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江南思想篇·····	(一)
江南的自然诗性思想·····	(二)
“异端”话语与江南主体精神·····	(八)
江南文化中理性与诗性的相互观照·····	(一五)
江南禅学的“自然”与“自悟”·····	(一八)
两位江南学人对“境界说”的现代解读·····	(二六)
研寻江南都市文化的美丽精神·····	(三一)
江苏的城市文化精神·····	(四〇)
江南国学:诗与思的中国对话·····	(六五)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江南审美篇·····	(七三)
从伦理美到自然美·····	(七四)
“清”之尚·····	(八〇)
“风清骨峻”的美学新观·····	(八五)
“清”与“怨”的历史传承与钟嵘《诗品》·····	(九二)
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的独特性·····	(九九)
江南与中国公文美学意蕴的历史嬗变·····	(一〇七)

思理为妙,物与神游——江南读书篇·····	(一一三)
“文心”与“为文之用心”·····	(一一四)
文采所以饰言·····	(一二〇)

“行人”抑或“佳人”的东坡先生 (一二八)

宗白华《流云》小诗与江南诗性文化 (一三一)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江南国学的坚守 (一三九)

为“现代文人”创制一种专门史 (一四七)

钱基博先生的现代文学史观 (一五九)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 (一七四)

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江南游历篇 (一九一)

忆游中山陵 (一九二)

游苏州一湿地有感 (一九二)

嘉兴记游 (一九二)

无锡重游 (一九四)

扬州弄堂 (一九四)

夜游西塘 (一九五)

沙滩记忆 (一九六)

锦绣山川 (一九六)

犹之惠风,荏苒在衣——江南闲居篇 (一九九)

我躺在旷野的草地上 (二〇〇)

给—— (二〇一)

思 (二〇二)

中秋怀远 (二〇二)

中秋感怀 (二〇三)

四时咏怀 (二〇三)

戊子春节感怀三首敬赠刘师梦溪 (二〇四)

端午诗节和骆冬青教授·····	(二〇五)
回家·····	(二〇五)
春风沉醉的晚上·····	(二〇七)
良辰美景奈何天·····	(二〇八)
一路芳华·····	(二〇九)
大河中的飞鸟·····	(二一〇)
后记·····	(二一五)
修订后记·····	(二一七)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

——江南思想篇

力有超越

江南的自然诗性思想

江南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它始终标举以自然为中心,以“质有而趣灵”(宗炳《画山水序》)的诗性存在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审美。它与注重人伦秩序、代表着黄河流域的诸夏文化一起,以南、北文化并立交融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宗炳主张“质有而趣灵”的自然诗性

一、自然诗性的起源

史初的江南地区经济地理环境比较特别:“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从个体生存的小生态环境来看,这个地区易于为生,以至使人产生了对自然环境的自然顺应感和深度倚赖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自然思想的悄然滋生,应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群体生存的大生态环境来看,江南地区



谢灵运体会到了江南人对自然的深度归依

的文明发展也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的‘文化龕’（cultural niche）中……文化龕之间虽然互相存在影响，但交往上却不如北方平原地区那么方便密切。”（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

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产生了顺应自然的泛神论思想；生活资料的易得，使伦理的教诲让位于审美的观照；再加上山、水、林、沼的阻隔，族群之间缺少交往与竞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长期处在自足封闭、闲暇少争的自然状态之中，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杂花生树”式的自然生发景象，与北方文明“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发展逻辑明显不同。对此，梁启超有着比较与总结：“（南地）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这种“南学之精神”，与“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清代学术概论》）的“北学之精神”，有着显著的差别。

处在这样的经济地理环境中，决定了江南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绝不是西方物、我两分式的认识论（真），也不是儒家身、心两分式的道德论（善），当然也不是现代心、脑两分式的审美论（美），而是“不知己之是己，不见物之为物”式的“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孙绰《游天台山赋》）、以“质有而趣灵”的方式存在的自然诗性智慧。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又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新科学》）。

“诗性智慧不仅是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心理功能。”（刘士林《中国诗学原理》）历史上江南地区由于没有食物链断裂（“断乳”）的危机，文明得以独立自在地发展，思想文化上更多的是对原始诗性智慧的自然延承与发展。因此，不从诗学的角度，是无法把握江南学术文化的本质精神的；不从诗性智慧的角度，是无法把握蕴涵其中的神韵的。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消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在其后的自然天道、玄学、南禅、心学、

诗学等江南思想资源中；由于诗性智慧的整体思维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与日常人生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表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的升华。

二、早期学者的自然诗性风貌

与孔子同时的季札是江南学术人物的先行者，他的身上表现出了与诸夏各学术流派不同的思维向度。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的朴素的自然观，以及从中流露出的泛神论思想。《礼记·檀弓下》记载，季札的长子不幸早亡，季札在埋葬他时，“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也就是说，墓坑不是很深，还没有挖出地下水；陪葬几乎没有，甚至没有特别添置一件新

的衣物，在北方看来，这几乎是薄葬，与死者的贵族地位毫不相称。原因何在，季札在唁词中给予说明：“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视死如归，归于物质，不迷信来世，自然通达，却又相信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眷念于今生，满怀着深情。其次，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深情。“延陵季子过徐，徐君好其剑。季子以当使于上国，未之许与。季子使还，徐君已死，季子解剑带其冢树，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为乎？’季子曰：‘前已心许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负吾心乎？’遂带剑于冢树而去。”（王充《论衡》）季札对徐君的这种情感，源于自然本心，跨越了生死的鸿沟，超越了世俗的伦理准则。东晋南朝士人风度实滥觞于此，这是江南学术文化思想里一直蕴藏着的宝贵传承。季札多次礼让王位，甚至弃室而耕、逃离家国；识见高深，兼收并蓄，博学清言；爱慕知识，不事著述，注重内心体验，所有这些，都成为以后江南学者的自然清雅象征。

孙武从齐国来到江南，《孙子兵法》吸收江南自然切用的思想，不迷信鬼神，而是结合江南地形（“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以法言兵（将“智”列作为将者的首要条件，把“仁”降至第三），用兵之中极尽



季札是江南学人的自然清雅象征

变化之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季札与孙武一文一武,成为江南学术起步阶段相互辉映的双星,成就与影响远远超过了被后世儒家誉为“东南学术之祖”的孔子学生子游。当然,子游“敏于道而不滞于形器”(朱熹语),为人为学也具有鲜明的江南学人特色。

江南学人和江南学术的这种自然诗性思想,与以中原为代表的北方学人和北方学术思想相比,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刘师培从地缘方面找寻个中原因:“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南北学派不同论》)王国维则从人性方面予以考察:“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屈子文学之精神》)这两位江南著名学者对南北学术的比较,同样可以适用于南北学人。

与以中原为代表的北方学术相比,在江南学术文化发展历程中,你看不到高高在上的圣人圣师,也看不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和经典,却能够看到许多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学者,以及一些怪癖得不合政治时宜、快乐得不近世俗情理之士,他们既喜爱自然诗性的生活,也钟情于自然玄妙的思想,而且往往以“直见本心”的方式

行事,著述里充满着自然精神与诗性智慧。

三、自然诗性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如前所述,历史上的江南地区由于不存在食物链断裂之类的严重危机,因而也没有经历过因应对严峻挑战而导致的“轴心期”,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体现更多的是对原始诗性智慧的自然延承与发展。

当饱历乱世的永嘉士族来到江南时,不仅失去了传统的物质、文化根基,甚至已经失去了思想信仰的支撑。但是,无论是抱残守缺的传统儒学,还是“贵无”的新兴玄学,甚至是追求“出世与超脱”的佛学,都在与江南自然诗性思想的风云际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发点。江南人的信仰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这种泛神论意识是江南道教产生与传播的思想基础。《历代崇道记》记载:“吴主孙权于天台山造桐柏观,命郭玄居之;于富春造崇福观,以奉亲也;建业造兴国观,茅山造景阳观、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随着孙吴集团的信仰与倡导,道教发展由自发转为自觉,并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以葛洪为代表的丹鼎派宣扬服丹成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神仙理论体系;陆修静吸收儒家礼法,对道教进行改革,促进了道教的官方化,

上述这些为抱残守缺的传统儒学派别自然而然地接受江南学术文化思想创造了条件。茅山上清派等道教团体远离政治,隐居山林,探讨玄理,陶弘景更是开创了一代道风,“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让“贵无”的新兴玄学派别感觉到殊途同归。当然,江南道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其信仰对象多是神仙化了的人,且多神论的松散形式,也有利于与追求“出世与超脱”的外来佛学找到共鸣。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谢

灵运《游赤石进帆海》)由于整个时代失去思想信仰(或曰信仰多元化),也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促使道教、玄学、佛学等思想在同一时代中并列局面开始形成,并在共同发展中逐渐远离了具体的世俗,亲近于自然的山水与清虚的玄理,形成了一种新的以“澄怀观道”为中心的诗性哲学。“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宗白华《美学散步》)江南的学者、名士们也由西晋末的对伦理政治近乎粗鄙的怪诞,转变为东晋时“居易而以求其志”



“山中宰相”陶弘景 戴敦邦绘



《美学散步》体现了宗白华“澄怀观道”的江南人生哲学

式的“不竞”之风，“玄礼双修”的优雅风度中包含着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崭新的诗性文化精神。“从此，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才开始获有了一个坚实的主体基础，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的审美精神的制约与均衡：一方面有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有了这种可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才使得在前一种生活中必定要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了它们的自由。”（刘士林《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江南学术文化与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沟通，通常将清虚的玄理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一种活泼而又空灵的特殊诗性特质，这在“理”学盛行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唐，当意识形态化的佛教逐渐教条化、世俗化，不仅容纳不了思想者自由思想的空间，而且由复杂的理论和烦琐的修行程序来表达的“佛法”已经成为一种“理障”时，来自江南地区、强调“得自然智慧”（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主张“无心合道”的牛头禅的出现，促使了中华禅的形成。在晚明，当“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逐渐意识形态化、已经桎梏了新兴的市民思想时，王阳



径山大师法融强调“得自然智慧”

明从人的直觉本心出发，强调“致良知”，要求道德自觉，突显主体精神。当然，江南学术文化的这些新发展，与江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密切相关。随着江南地区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和书院教育的快速发展，包括许多普通民众在内的江南人对精神生活不断萌发新的追求，市民文学、古玩收藏、藏书、出版、园林艺术、饮食、娱乐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应运而生，同时也为诸多学人获得了不依赖于政治的存在，山明水秀的江南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因此，包括文学、学术在内的高雅文化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哲学与艺术融入日常人生，衍生出许多更加精美的戏曲诗文、小说弹唱，以及工艺器物与园林文化。